

第一章

家庭和社会环境

第一节 家庭

李大钊少年时代的家庭情况，直到目前第一手材料还很少。他在 1914 年所写的《我的自传》中说：

一八九〇年，我出生在离北戴河大约百里的海滨，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了，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

李大钊的这一叙述，大体上勾画出他少年时代的家庭情况。

1927 年 4 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在他所写的《狱中自述》里又一次谈到少年时代家庭的情况：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县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李大钊的这两次回忆，是我们研究李大钊少年时代家庭情况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是应予高度重视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加以比较，《我的自传》和《狱中自述》所表述的部分内容却又存在着某些矛盾的。例如：

关于李大钊出生的时间，《我的自传》里说是 1890 年，而《狱中自述》里却没有直接说明，而只是说“现年三十九岁”。按照中国传统的最宽的一种计算年龄的方法，即刚出生时算一岁，过生日就算两岁的计算年龄方法，那么，1890 年出生的李大钊到 1927 年 4 月，就不可能达到 39 岁，而只能是 38 岁。如果采取另一种计算年龄的方法，即出生后按月计算，到第一次过生日时才算一周岁。这样，到 1927 年 4 月，李大钊则是 37 岁。

又如，李大钊家庭人口变化的情况。《我的自传》说：“刚刚两岁”，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十五岁的时候”，祖父母“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狱中自述》却说：“在襁褓中即失怙恃”，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堂肄业……不久，祖父弃世。”我们不难看出，两岁丧父，三岁丧母的说法与“襁褓中即失怙恃”的说法也并不一致，而 15 岁失去祖父母与 16 岁以后“祖父弃世”的说法更存差异。

李大钊是一个做事非常细致、非常严肃认真的人，对于上述文字中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细致研究，尽可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和判断，而不应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

关于李大钊出生的时间和家庭情况，近些年我国研究者已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据考察研究，李大钊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即 1889 年 10 月 29 日）出生在直隶（今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的父亲叫李任荣，是大黑坨村的好学生、好少年。李任荣由于敏而好学，知文达礼，为乡里所称道。可是正当李任荣年在韶华的时候，1888 年 6 月 23 日渤海湾发生了大地震，强度为 7.5 级，乐亭县的大量房屋被震倒塌。李任荣在病中冒险抢救生母，背着她向安全的地方转移。由于惊吓和劳累，李任荣当场吐血。其后病情日重，终于在 1889 年 3 月即李大钊出生前约八个月去世，年仅 23 岁。

李大钊母亲周氏，是心灵手巧、善良、温和、醇厚的人。她把家中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家庭充满着幸福。在遭到突然的意外的人生不幸的打击以后，她整天生活在悲痛的眼泪当中。她已经怀孕，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勉力支持，在孩子生下以后不久^①，也过早病逝。从此，李大钊成为失去怙恃的孤儿。

李大钊的继祖父李如珍老人，当时已 60 多岁。他素来能干、正直，早年曾到“关外”沈阳一带做行装商。由于遭到土匪的劫掠，不得不辍业回乡。他有 3 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过继二弟李如珠的儿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夫妻先后早逝以后，李如珍完全担起对孙子抚养、教育的重担。

当李如珍老人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抚养孙子的时候，他的老

① 据黄真、姚维斗、朱乔森《关于李大钊的生年问题》一文，转引自韩一德、王树棣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下）第 310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伴却不但没有成为他的有力内助，反而给他制造了种种困难。据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老祖母“为人憨傻，心地又狭窄，除了她的亲闺女老捡姑子以外，心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对她的过继孙子，她连眼皮也没撩过一下，还嗔着老头子疼孙子”。不仅如此，这个老捡姑子和她游手好闲的丈夫，为了想得李家的家产，甚至还要“加害这个父母双亡的过继侄儿”^①。李如珍怕老伴伙同女儿和女婿把孙子害死，不得不特意加以保护、照料。

李大钊在父母去世以后，只有祖父李如珍才是他惟一的亲人。但由于老人终究年事已高，在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堂以后不久，就去世了。

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有两点和李大钊的“自传”和“自述”不同。即其一，研究者认为，李大钊应是生于 1889 年，而不是“自传”中说的生于 1890 年；其二，研究者认为，李大钊是“遗腹子”，而不是“自传”中说的两岁丧父，三岁丧母。

对于上述的前后不一致，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呢？笔者认为：

李大钊所写的《我的自传》和《狱中自述》，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写的。其中所出现的不一致，都是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缘由的，并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充分地注意到这种特定的条件和背景，就可以看出，他笔下的这种不一致，不但不是由于草率和疏忽，反而正说明他的机智和认真。

关于年龄的计算方法，以传统而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习惯并不相同。《我的自传》是李大钊到东京以后进入早稻田大学之前，在基督教青年会补习英文的练习课上写的，其英文教师是美籍的

① 据《李大钊年谱》（《李大钊年谱》编写组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载，李大钊母亲周氏“于 1890 年初去世”。这时，李大钊的年龄还不到半岁。

阿瑟·鲁宾逊。因此，李大钊《我的自传》计算年龄的方法，采用了外国人的习惯，即按照用实足的周岁计算方法，并首先运用了公元纪年。而《狱中自述》是在反动的封建军阀强迫下写的，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所以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用虚岁（生下来就算一岁）计算年龄的方法，径直地说自己“现年三十九岁”，而并不标明生于公元哪一年。正是由于两者计算方法的不同，所以，前者说“年十五岁的时候”祖父去世，而后者却说是“年十六”以后弃世。这样，两者恰好相差一岁。按照《狱中自述》是按中国传统的计算年龄的方法来理解，“现年三十九岁”经过推算，恰恰是出生于 1889 年，这和近些年来研究的结论完全一致。

中国人还长期习惯于用具体的岁数说明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这种记忆，一般不会错。李大钊所提到的几个年龄数字，如“现年三十九岁”祖父去世时年龄 15 或 16 岁，其实都是对的，只是计算方法不一样。中国人用公元纪年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而在此以前长期使用的则是皇帝年号纪年。人们要把这种历朝历代频频更换的年号一下子换算成公元某某年，如果不依靠特殊的计算方法和辅助手段，恐怕任何一个高明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单凭记忆把历代皇帝的年号和公元的某某年都准确对号。因此，李大钊尽管能够记住自己生于大清光绪 15 年，但这个 15 年究竟相当于公元的哪一年，那就很难做到准确对应。更何况《我的自传》是在英文练习课上写的，在时间上不可能不受到严格限制，在字数上不可能没有一定的要求，细致的推算是根本难以做到的。因此，1890 年出生的说法，尽管是不准确的，但却是有缘由的。

李大钊父母去世时，他都还在无记忆的时候。因此，他的所有了解，都是靠间接得来的。从一般事理推论，李大钊在出世前几个月父亲即已去世的这种不幸情况，他后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是，“遗腹子”的情况，终究在社会上是少见的。正是因为少见，

所以便多少带有新奇性。这种新奇性，无论在东京的外国人面前，还是在国内的反动军阀面前，都是不必要讲的。在此情况下，李大钊采取含糊笼统的说法，也是最为适当的。

李大钊少年时代的家庭，是培养李大钊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最初摇篮。他的不幸，毫无疑问对于他的成长和未来，都有很大的影响。“磨难出英雄”，这是中国人民对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的一种总结。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确都有过许多特殊的磨难，从而铸造出特殊的意志品格。李大钊其后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意志和品格，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他少年时的种种遭遇中得到理解。自然，对于这种影响，也不应过分夸大，更不应绝对化。

第二节 社 会 环 境

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是紧密相联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家庭环境的影响相比，毫无疑问，前者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决定性。从李大钊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的基本思想观点与政治态度的确立与演变，没有哪一项单是由家庭环境的影响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和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不恰当地夸大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之绝对化。这正是庸俗社会学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非常片面、幼稚和落后的。只要我们稍加辨析，就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于人的决定性的或较大的影响，是在以下的情况发生的：即其一，年龄幼小，没有或缺少独立生活或生存的能力；其二，知识幼稚，没有或缺少独立地接受信息、处理信息、判断是非与进行自我选择的能力；其三，道德水平低下，没有或缺少

以整个社会与人类的真理、正义与理想作为决定行动的觉悟。非常明显，家庭对于人的影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长、视野的扩大、谋生能力提高等不断变化的，并且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因此，过分地夸大家庭影响对于人的思想行动和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使之绝对化，实质上只能是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反映，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闭塞、狭隘、落后的一种反映，是个人与社会的结合方式僵化，缺少多种灵活性、适应性、选择性的一种反映。人们的思想归根到底来自客观世界，但客观世界是无比复杂丰富，而决不是单纯狭隘的。人们接受客观世界信息量与处理加工的能力与家庭影响作用的大小，恰好成反比例。正是这种反比例，成为人口素质差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对于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探讨，不应在他家庭影响之类上大做文章，而应只把它作为一个小的背景。这个小的背景，必须与较大的背景——社会环境，与最广阔的背景——时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有其较为恰当的意义。而且就在这三种不同层次的背景中，只有中间这个环节，即特定的社会环境才是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家庭背景，虽然影响最为直接、强烈，但终究太狭窄、太贫乏、太凝固。它对于具有社会性的人特别是在社会性属于较高层次的人，它根本不能作为他指导行动的依据。而所谓时代背景，则又往往过于广阔，甚至不着边际。人们一方面不易确切把握，一方面在认识上缺少具体性，对行动的影响缺少直接性与迫切性。因此，它往往只能给人们思想行动提供大致的参数，而惟有具体的社会环境，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才产生大量的、具体的、实际的、可行的决定性影响。

从李大钊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生于清末直隶的这个社会环境，对于他的思想行动曾产生最有决定性的影响。离开清末直隶这个

特定的社会环境，他的学习与生活道路、思想与政治态度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将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当时直隶这个社会环境对于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究竟应该特别注意其哪些特点呢？

一、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首先是在东南沿海，其后是逐渐向北、向内地延伸。到了 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已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直隶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地区。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面的。随着这种侵略给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也是复杂的、全面的。

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天津被辟为商埠，实行对外开放，开始了畸形的现代化过程，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现代化都市，成为北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现代化最重要的条件和标志之一——铁路，开始在这个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李大钊出生前两年即 1887 年 6 月，开始兴建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李大钊出生的那一年即 1889 年 8 月，开始兴建芦台到汉沽的铁路。李大钊两岁时即 1892 年，天津大沽到滦州的铁路就通车了。如果我们把方兴即毁的中国最早的那条淞沪铁路不计，那么，这条线上光绪 7 年（1881 年）所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线，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

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出现近代大工业和产业工人。1878 年李鸿章在唐山开平镇成立开平矿务局，1881 年全面投产，工人达 3,000 多人，从而使这里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诞生地之一。

帝国主义的侵略，猛烈地冲击着中国这个古老的闭塞的宗法社会，强烈地震动了尚处于蒙昧状态的人们，迅速地改变着中国

这块地区的面貌，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等不断地发生变化。到了这时，李大钊出生的乐亭县大黑坨村，再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僻壤，而是与新的时代与近代文明发生了联系。从大黑坨到北京通向山海关延至沈阳的北宁路的最近处，仅约 40 公里。通过这条铁路，可到祖国一个个已经开化的地区，可到欧洲大陆。大黑坨到唐山约 95 公里，到天津约 200 公里，到北京约 300 公里。在中国人民这个伟大的儿子——李大钊刚刚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地为他准备了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客观条件。

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与觉醒。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北方农民对于侵略者的一次伟大的反抗运动。运动失败以后，中国人民的苦难更为深重。侵略者根据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在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上的 12 个城镇和车站驻扎军队，直接地控制这个地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暴行，随时可见可闻。

二、清王朝统治的心脏和推行“新政”的典型

北京是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从保定、天津到唐山一带，或者说整个直隶，都是清王朝统治的心脏区。乐亭县属永平府建制，就全国来看，它也是地近京畿。

从 19 世纪末开始，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北洋大臣，成为清王朝统治的最主要支柱。所以，直隶这个地区是中国封建势力的大本营，皇权主义最顽固的堡垒，是反动统治最强、对人民控制最严的地区。和东南沿海和南方一些地区相比，这里是革命力量薄弱而又活动最困难的地区。

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清王朝不断面临政治、经济和臣民信任的危机，同时也艰难疲惫地来不断变动自己的政略和

策略，采取了种种巩固统治的应变对策。其中，尤其在“庚子事变”以后，它所采取的“变法”无论在深度、广度、速度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又叫清末“新政”。在试行这个“新政”过程中，直隶走在全国的最前列，成为试行的重点地区。

三、袁世凯的老巢和北洋势力的基地

直隶在清末“新政”中处于突出地位，是和袁世凯分不开的。而袁世凯其后之所以能在中国造成那样的地位，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又是和直隶这个地区特别是和他在推行“新政”中的作用分不开的。

1901 年李鸿章死后，11 月袁世凯奉诏进入直隶，次年继李鸿章署衔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从而成为封建王朝的疆吏之首和统治者的股肱。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至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时间将近 6 个年头，成为他在清王朝灭亡前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是奠定他辛亥革命以后一切活动基础的时期。在他督直期间，使北洋成为“新政权舆之地”^①，被人称道“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具瞻”^②，各行省或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③。仅以学校来说，直隶的学生人数在全国仅次于四川，为全国第二位，而当时直隶的人口仅为四川的二分之一。到了 1915 年，直隶的学生人数竟成为全国第一。袁世凯不仅训练并掌握新式军队，成为有实力的强人，而且他在“变法”和“新政”中，还扮演了很不寻常的角色，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以致在其后，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代表“改革”的“新人物”。这正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后能够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直隶成为袁世凯

①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资料》第二辑（下）第 931 页。

夺取权力和进行统治的主要基地，是他所培养的北洋反动势力的老巢。

四、美丽的自然环境与苦难的人民生活

李大钊天性热爱自然。他的家乡，离渤海约 10 多公里。由于东、西、南三面都是渤海湾汉，当地叫做“海袖子”。乐亭县之北是昌黎县，两县以滦河为界。由大黑坨村向北眺望，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望见奇丽高耸的碣石山。阴晴变幻的山峰，动静不定的大海，由巍峨和辽阔不同格调所组成的自然壮美，都是李大钊小时候所喜爱、所陶醉的，从而也陶冶了他的性格。但是，乐亭县对于李大钊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它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周围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

乐亭当时是整个腐败的中国社会机体的一个角落。它偏处海隅，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滦河经常泛滥，土匪海盗不时绑票抢掠，官绅残酷压榨剥削，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生活的这种苦难，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激起他无限的同情；而唐山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正为他进一步觉醒和建立新的世界观提供了客观依据。

李大钊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这些特点，对李大钊的学习与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发展，具有很大的制约与影响。

第二章

国内的学习生活

第一节 由科举道路到永平府中学堂

一、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从四五岁起，李大钊即由祖父教他读书识字。6岁时，祖父送他到本村老谷家私塾，就读于单子鳌先生。单先生为他取名叫耆年，字寿昌，按照科举的路子对他开始了启蒙教育。9岁时，祖父又把他送到赵辉斗先生处读书。过了两年，祖父又把他送进乐亭县城北井家坨的宋举人家的专馆。这个专馆的老师黄玉堂，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学识较高，为李大钊参加科举考试作了进一步的准备。经过了大约10年的准备，李大钊参加府试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二、科举制的废除

正当李大钊紧张地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却

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科举制度，不但动摇了，而且被废除了。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整个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实行思想禁锢的工具；一方面又是培养、选拔大小封建官吏的根本方法和途径。封建统治者依靠这个方法和途径，把自己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并运转下去。

科举制的弊害，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痛加鞭挞。尤其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传入以后，这种制度的弊害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但是，如前所说，由于它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根本方法，所以，对它进行彻底改革又谈何容易！

戊戌维新的志士们曾经试图对科举制度加以改革，但不幸遭到了扼杀。对此，梁启超表示深切地惋惜和浩叹。他说：

除旧弊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关，而不闻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己也^①。

梁启超的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废除科举这样一个本来就是过时的制度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但是，梁启超所看到的仍是中国封建政治特点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其另一个方面。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看出其中的某些弊害而不敢言，而不能言，这种情况确是客观存在。但是，这种不敢言、不能言的根本

^① 梁启超：《戊戌变法记》。

原因，却并不是怕“下面”，怕触犯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的“下面”某些部分，而是主要怕“上面”，怕触犯最高统治者，怕触犯人们一般难以臆测的最高统治者的喜怒。其实，只要当时最高的封建统治者认识坚定，下定决心，有梁启超所想象的那种“雷霆万钧手段”，就能使人们由不敢言而敢言，由不能言而能言，就能使“下面”那些任何敢于阻挠的人望风慑服。清王朝在 20 世纪初所采取的废科举、兴学校的政策，就大体是这样。

1901 年，慈禧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命王公大臣督抚等，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因等省并，各举所知，条陈上奏”，从而，把科举问题正式提到改革的日程。

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既下决心，被梁启超认为不敢言的那个张之洞，却竟一马当先！1901 年 7 月 26 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停罢科举”；奖励游学”。接着，他们又三次会奏。在 1901 年 8 月第三次会奏中，他们还特别提出要“多译东西方书籍”。同年 10 月，“江鄂书局”就正式开办了起来。

根据慈禧的上谕，1901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决定首先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决定从 1902 年起，乡会试中废八股程式，改试策论。

1901 年 9 月 14 日，清政府正式下了兴学诏，令各省书院在省城的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令多设蒙养学堂。

两天后，即 1901 年 9 月 16 日，清政府又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人们知道，伟大的鲁迅就是在这一决策下于 1902 年初被派往日本的。选派留学生令发出仅约 3 个月，即 1901 年 12 月，四川省就选派出第一批赴日留学生。

社会在死水一潭时，几乎谁也很难突出地表现什么活力、个性，一切都为虚伪所掩盖。但在剧烈的变动过程中，不少人就会

自然地露出头角。就在清政府下达兴学诏的同时，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试办山东学堂事宜，并报陈已拟好的《试办章程》，决定先在省城办起大学堂。两个月后，即 1901 年 11 月，山东大学堂开学。清政府随即拿它作为“典型”，谕各省通行，依照举办。

从兴学诏发出到年底，时间不到半年，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就办起了各级学校，开始出现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根本不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

1902 年 1 月 7 日，慈禧从西安回到了北京。第三天，她即令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裁定章程具奏。按照当时的制度，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亦同时管全国的教育。仅 8 个月，张百熙等就拟出了包括六个章程在内的各级学校章程。其后，被钦定为学堂章程。1902 年，清王朝在抓了全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并制定出一套的章程，这样，就使正在兴起的办学热潮有了统一的规章可循。

从 1903 年开始，清王朝“变法”、“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推行者，对教育上的问题又提出了种种过渡性的政策、方案，企图用较快而又较稳的办法，把实际形成的两种教育制度逐步转型，成为一种教育制度。

1903 年 3 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提出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同时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作学堂取中之额。对于由学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待遇问题，早在 1901 年 12 月，清政府政务处和礼部就已作过规定。规定凡是由学堂考试合格的人，均分别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相应的出身。这里所谓由科场递减之额，酌量作学堂取中之额，即是这一规定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1904 年 1 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再一次奏请递减科举，重视学堂。认为只有加速这种改革，才能仰副朝廷“实事求是之圣

意”。清王朝据他们的奏请，谕从丙午 1906 年科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办齐，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归学堂考试。按清王朝这种诏令，大约需经过 10 年即到 1912 年才能全部停止科举考试。

清王朝的这种计划，自然是更稳妥的。但是，时代变了，有的大臣却竟敢于不以为然。1905 年 9 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再次提出奏请，请求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堂，而不应把它拖到十年以后。袁世凯的这种奏请，实际上是在反对清王朝“俟各省学堂办齐”，再停止科举的那个诏谕，但清王朝却对他也没有问罪，反而采纳了他的奏议，改变了决策：诏准自丙午（1906 年）科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试都一律停止，并迅速颁布各种教科书，在府、州、厅、县的城乡都遍办学堂。从而，使隋朝开始延续了达 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到此竟宣告结束。历史说明，清末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实成为中国其后各项改革的关键。

三、进入永平府中学堂

历史和偶然性是分不开的。当清王朝废除科举诏令下来的时候，李大钊正在永平府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当时的袁世凯等对于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决策“紧跟照办”，而不敢再提异议，那么，清王朝就决不会改变原来的决策，就决不会从丙午科开始把科举制废掉。如果让李大钊按照清王朝原来的决策在科举道路上继续再走 10 年，那么，李大钊就决不是其后的李大钊，而中国其后在 20 世纪的命运，也恐更难推知！

关于这场考试的情况，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回忆说：

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止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堂肄业，在永读书二载。

从李大钊这个自述的原稿上看，他对于这次考试结果的表述是颇费斟酌的。在初稿上他写“甫经府试”，在二稿上他写“府试中”，到了三稿才写“试未竟”。“甫经府试”和“试未竟”是基本相近的，但“府试中”则说明这次考试已有了最后的结果。对于这三种不同的写法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恐怕还应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中去寻找答案。

如果严格按照科举考试的程序要求，李大钊这次考试大约应是没有最后的结果。因为，废除科举的诏令是在考试当中接到的，常规应办的一系列手续事项（例如张榜等），必然就来不及办完。从这种情况来说，就是“甫经府试”和“试未竟”。但是，从“遂入永平府中学”的情况来看，李大钊的这场考试，也可以说是有了结果。因为，当时参加考试的人很多，而参加考试的人并不是都能直接进入永平府中学堂的。根据清王朝政务处和礼部 1901 年 12 月的规定，不同级的学校毕业生可以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不同出身。那么，反过来说，不同科举出身的人，也可以等同于不同级学校的学生。按照不同的序列，只有达到“府试中”的水平，才能直接进入永平府中学堂。从这个情况来说，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堂，也就是意味着“府试中”。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李大钊经过 10 年苦读在文化上已经达到的水平。

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堂学习，是他整个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当时的新式学校，按照后来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爱作空想泛论的人看来，当然不够新的标准，但是，它终究抛弃了旧的科举轨道，成为培养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正是从这里开始，李大钊开始学习“夷人”的语言——英语，学习了“夷人”的启蒙科学。

据有关材料分析，永平府中学堂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例如，